

85.4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4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宋世伟

31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总 第 25 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沙滩北街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 10印张 250,000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书号：10248·028 定价：1.50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总第25辑

目 录

· 创新座谈会专辑 ·

- 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思潮····· 鲍 昌 (1)
在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 瑤 (1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纪要····· (23)

· 论 坛 ·

梳理新文学的真实发展线索

-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序····· 钱谷融 (34)
关于历史感····· 支克坚 (38)

· 文学史研究 ·

- “五四”新文学的理性色彩及其
对现代文学发展的意义····· 刘 纳 (44)
论历史讽喻小说····· 金宏达 (65)

• 纪念郁达夫 •

郁达夫前期小说与

-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 周炳成 (82)
- 小说的一种特殊结构方式
- 论郁达夫小说的情绪结构 辛宪锡 (103)

• 比较研究 •

- 鲁迅和郭沫若前期审美趣味比较论 周惠忠 (113)
- 同中见异 匠心独运
- 《药》和《夜》的比较分析 何益明 (126)

• 作家作品 •

- 谈废名的小说创作 冯健男 (140)
- 论《边城》的思想倾向 孙昌熙 刘西普 (152)
- 从《北望园的春天》谈起
- 关于骆宾基三、四十年代的创作 韩文敏 (164)
- 试论柔石早期的思想和创作 朱成蓉 (178)
- 被埋没了的明珠
- 试论朱湘的诗论 钱光培 (193)

• 校勘与辑佚 •

试谈新文学的校勘问题

- 《新文学资料引论》之一章 朱金顺 (207)
- 关露的自传体三部曲 张伟 (222)
- 叶紫悼念彭家煌的文章 陈福康 (224)

• 当代作家谈现代作家 •

- 从我的前辈沈从文先生说起蔡测海 (230)
我曾“偷吃禁果”.....李发模 (233)

• 书 评 •

鲁迅研究史上的丰硕成果

- 三本鲁迅研究专著的学习札记陈鸣树 (236)
一部有特色的书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漫评刘泰隆 (250)

• 旧文录载 •

- 桂花蒸 阿小悲秋(小说)张爱玲 (260)
“龙”的生活与“龙”的艺术
——读张爱玲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丁尔纲 (256)

• 资 料 •

- 罗淑年表马小弥 (276)
胡风著译系年目录(下)赵全龙 吴晓明 (283)
1985年4~6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 (297)

• 动 态 •

现代作家研究史上的一次盛会(姜志洁, 205) 资料征集简讯
七则(林, 177) 现代文学书讯三则(柯言, 304) 法国鲁
阿夫人来华访问(昊, 163) 秋吉胜广来北京大学研究《野草》

(耿明宏, 151) 中岛碧应邀来京进行研究工作(冯炎, 125) 老诗人汪静之发起建立湖畔诗社纪念馆和重建湖畔诗社(邓小白, 139)

编后记 (30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总目录 (307)

启 事

根据文化部有关通知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自1986年始改为论文集形式出版,定名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辑》。《文辑》将标示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好水平,加强学术信息交流、注重青年论文,务使内容精萃充实。明年暂出两集,每集25万字,定价1.60元。除新华书店发行外,仍可办理邮购手续。为避免平寄遗失,一律采用挂号,全年两册加邮费共收3.60元,请于12月末前办理,汇款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2号《文辑》编辑部邮购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辑》编辑部

1985年12月

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思潮^①

鲍 昌

一

文学史上最艰难的课题之一，就是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和文学传统的推陈出新。我曾在一篇题为《出新詹言》的短文中，提出“全方位思想”（或名“座标系观念”）。那意思是：任何文学传统（包括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都有纵横两条线的交叉。纵向的线，指的是本民族文化传统；横向的线，指的是外部来的文化推力。纵横两条线的交叉，构成独特的文学座标系。因此，对任何一个文学现象的观察，都应当是全方位的。

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时间并不长，若从一九一九年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止，恰好是三十年。中国古例：三十年为一世；人之一生也为一世。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的三十年间，现代文学走完了一段艰辛而又值得自豪的历程。这段历程，恰好与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一终始。因此，有时为了描画出它的宏观政治背景，便把它称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

中国的当代文学，一般是从新中国建立时算起，到今天已经三十六年了。这段时期，长过了现代文学的三十年。但中国的当代文学，还可以划分为几个小的阶段。我个人认为，若是把一九

^① 本文为鲍昌同志在创新座谈会上的报告——编者注。

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六年区分开来，将会更有意义。

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我们都应当从全方位的、座标系的观点来研究它们。这首先是说，它们本身都是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相结合、上下限可以适当截断的发展座标系。其次的意义是说，它们的发展都符合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趋向，即是本国本民族的传统与外国民族的推力的交叉，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此外，各类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表现得特别强烈。就中，我想特别指出政治这个强大的上层建筑，五四运动以后，它对中国文学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表达这个本质的基本概念有两个：（无限的）不间断性（Kontinuität）和，点截性’（= 不间断性的否定，即间断性）。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与（时间和空间的）间断性的统一”（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3页）。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都是中国文学史的不间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正是由于历史的不间断性，形成其纵向发展线，使它们归根结底成为中国文学史的延伸。同时又由于历史的间断性，使它们变成上下限可以截断的独立座标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五四运动发轫的中国现代文学，同已往的文化传统有极大的截断性。外国民族的文化影响，在这时期是空前强烈、空前深刻的。它刷新了文学的总面貌，造成文化传统“连续性的中断”的表象。因为从五四运动之后，我们才有了体裁、形式、技巧焕然一新的新文学。这些新的体裁、形式与技巧，基本上是从国外引进的，至今还为我们所利用。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初创，主要是文学潮流的转变，或者说是文学传统的更新。

然而，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截断，情况有所

不同。这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潮流并未有质的变化，原有的文学体裁、形式和技巧一直沿用下来，只是其艺术内容有了突出的变化。因此，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截断，更多是政治性的。正如我们可以把中国现代文学称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一样，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当代文学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文学。非常明显，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必然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作为一段历史，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一去不返了。但对它的研究，今天还有重大的意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作为一个间断而又没有间断的文学运动，呈现出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可以让我们作出理论的分析，来为今天的文学发展借鉴。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重温一下恩格斯的话：“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3页）

我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能解决当代文学的许多问题。二十世纪的自然哲学有个新的发现：任何物质系统都不可能在时间运动中完全再现。因此，历史不能重复，历史的经验也不能照搬。但是某些大量重复而又不断取得成效的经验（一般被人们上升为规律或原理），是可以为后人借鉴的。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启示”。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对今天的我们是有很多启示的。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完全可能而且事实上正在影响当代的文学思潮。谈到这里，有人会问道：“什么是文学思潮？”我的理解是：文学思潮是某一作家群体在特定的时代精神制约下，通过自

己的创作体现出的社会心理、哲学倾向、审美理想和艺术表现方式的总和。文学思潮是历史的产物，它与作家群体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文学社团、流派、风格类型有密切关系，但不完全等同于后者。从表面上看，文学思潮仿佛是“普遍性思想形式”；但归根结底，我们能找出它与社会政治乃至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定因果关系。文学思潮也确实具有不同国限内的普遍性。假如它觅到了相类似的社会生活土壤，它可以跨越地域，跨越时代。因此，文学思潮又对社会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它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影响，那是众所周知的。

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现代文学中那些能上升到规律或原理的经验，看看它们能否对当代文学思潮产生必要的影响。

二

中国新文学是五四运动前发生的。从本质上说，它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新文学，通常人们注意的是文学语言、形式的变化，殊不知语言是思想的现实。正因为当时封建主义的旧文体、旧词汇已经容纳不下现实生活和思想发展的新内容，这才有了文学语言和形式的变化。早在一八八七年，黄遵宪就提倡“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要求文学能“适用于今，通用于俗”。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以后，也试图用“新文体”来宣传新思想。十九世纪最末一两年，还有人们不大知道的裘廷梁、陈荣衮等人，发表过《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和《报章宜用浅说》等文章，鼓吹“崇白话废文言”，用来“便贫民”、“开民智”。事实上，这时上海等地早已有白话报、白话小说在流行了。今天看来，裘廷梁、陈荣衮想利用白话文“开民智”的主张，算是说穿了白话文运动的本质；不过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展开广泛的讨论，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

新文学运动的本质是民智的开发，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往往热衷于对某一作家或作品的研究，而忽视了宏观的规律性探讨。我还有一个感觉：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对于新文学运动前夜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状况注意得不够。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立起文学座标系的纵向的轴，寻找出深刻的历史规律。

具体些说，在考察新文学运动的终极原因时，我们不能忽略以下这些因素：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的形成，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勾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等等。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后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的努力。这批先进分子的名单可以拉得很长，从洪秀全、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直到孙中山。而这批先进分子吸收过来的东西也非常复杂，从最早的上帝福音到“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无所不有。大约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穷则变，变则通”的社会历史进化观念，开始为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我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发轫者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全受过这种思想的熏陶。

但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的努力，实际上就是一场曲折复杂的思想解放运动。陈独秀在他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明确地提出过解放的口号，他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欧洲近世历史为解放历史；……解放云者，夫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不管陈独秀怎样不准确地把民主说成是人权，但他的这段话在当时可称之为空中警咳，震聩发聩。

所以我说，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总结出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经验：——思想解放。在五四时代，思想解放的基本目标是走向民主，走向科学；而它所要冲决的罗网，是压

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用鲁迅的话来形容，就是要打破桎梏中国人民的“铁屋子”。

上述的思想解放运动持续了数十年之久，通过五四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五四运动并未完成它的全部思想解放目标，但在文学领域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这方面，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都立下了功勋，不过把文学革命从内容到形式结合起来的最好的典型，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狂人日记》的成功，正在于当时被卫道士们斥为异端的、彻底的思想解放。不仅《狂人日记》如此，我敢肯定地说，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最优秀、最有影响的作品，全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

这就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思想解放，是现代文学作品的精髓。我认为，这一启示对当代文学思潮——特别是对八十年代的当代文学思潮非常有用。大家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实际上又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第131页）这段话，完全适用于文艺界。就是说，它应当成为当代文学思潮的中心指导思想。

认真考察粉碎“四人帮”后的文学思潮趋势，恰好是一步步走向思想解放的。无论什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是在一步步穿过文学的“禁区”，一次次挣脱教条的束缚。可以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文学，真正变成了“人学”。它从人的本质出发，来观察思考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谁都知道，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愈是从人的本质出发，愈能

深刻而全面地反映当前的社会关系。我认为，当代文学思潮的主流，可以归纳为如下的公式：人的命运，以日益丰富的形态同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融合。而在这融合过程中，日益显露出主观与客观的双向交互影响。这一文学思潮趋向，与五四以后“为人生”的文学，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很大不同。同时，作为思想解放的表现，它的形式、方法和经过的道路，也同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有很大的不同。这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无法重复，也不可能重复。

直到今天，文艺界人士对于中国文学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还存在着歧异的认识。甚至在同一营垒中，人们竟因此分门别派，尖锐对立。阐明真理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请出历史老人作证。因此，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思想解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一项很有现实意义的任务。

三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纷纭复杂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的涌现。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往往是以某一刊物的同人为核心组成的；不同的社团和流派，则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这里，社团、流派、刊物、风格作为一组可变参数，使文学实践（从思想到艺术）呈现出活跃的局面。

根据资料，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头十年里共有一百五十四四个围绕社团和刊物形成的小流派。《新青年》自然是影响最大、发轫性的刊物，它带有宽泛的统一战线性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建立的文学研究会，掌握了《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等刊物，那是“自然主义”亦即现实主义思潮的代表。一向被人简单地称为浪漫主义文学社团的创造社（掌握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其中的作家并非都是以

浪漫主义手法写作的，后期创造社尤其如此。关于创造社文艺思潮的嬗变和成员的分化离合，我以为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与创造社相接近的太阳社、我们社，以及与鲁迅有密切关系的语缘社、莽原社、未名社，都涌现出一批重要的作家。即使在政治观点比较一致的左翼内部，也还有许多小刊物、小流派。其他如沉钟社、浅草社、狂飚社、弥洒社、秋野社、白露社、奔流社、飞鸟社、绿波社乃至抗战以后的七月派等等，全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痕迹。值得注意的是，成员复杂的新月派、论语派，特别是围绕《现代》杂志的一些作家，他们的文学思潮很需要重新给予科学的研讨。我不否认，他们之中有些人同西方的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新感觉主义有联系；但他们的成员太复杂了，彼此的观点并不一致，而且各个人的思想前后也有变化。我们不能笼统地看待他们，具体的人需要具体的分析。

如上所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具有一个比较丰满的发展态势，那就是文学社团、流派、风格的多样化。这一特点，胜过了建国以后十七年间的文学，更不必说十年动乱的时期了。三十年间的现代文学，能够推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文学大师，同这一特点具有直接的关系。

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社团、风格、流派问题，我以为下面的几点很需要深入探讨。首先，是现代文学思潮的主流问题。我曾在《现实主义的凯歌行进》文中指出，尽管五四运动以后兴起了众多的文学社团和流派，但其主流还是执着于人生的现实主义。我看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中的大多数论者，与我的看法基本相同。现实主义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不仅由于它从来就是反映生活的根本方法，在文学史上源远流长；而且，解放前的旧中国，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最佳的客观环境。那时，中国是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广大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人们要争取生存、争取解

放，这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同时，以现实主义为特色的古典小说盛行于民间，这就使能够反映人民疾苦而又为人民熟悉的现实主义文学，得为最多数的读者接受。因此，现实主义的凯歌行进，就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规律。这一特征，这一规律，是否符合建国以后三十年的当代文学呢？是否可以构成当代文学思潮的主流呢？我觉得应当深入进行探讨。至于我个人的看法，那是肯定的，其理由已在上述的拙文中阐明，这里不再赘述。

其次，是各文学社团、流派、思潮的竞争和消长问题。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的各种时髦文艺思潮逐步输入。本世纪初，就有某些颓废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家作品介绍过来；其后，又迭次译介了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构造主义、新感觉主义等许多流派理论和作品。这是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李金发等一批作家在中国倡行“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这些人同现实主义作家之间，有过思想上的交锋，有过创作上的竞争。他们想把新颖的艺术手法导入中国文学，动机未必都是坏的。但他们兜售的颓废的、虚无的、变态的、神秘的乃至色情的思想倾向，并没有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持久的文艺运动，没有在文坛上造成象西方那样重大的影响；他们甚至没有组成宗旨一致的社团，聚合成较大的作家群。例如集中了一批“现代派”作家的《现代》，差不多从第二卷起就转了方向。可以说，“现代派”文学在同现实主义的对垒时，最后归于失败。这一现象，非常引人深思。我希望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对这一现象进行细致的分析。要知道，在八十年代的今天，中国文学应当怎样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是否可以把“现代派”文学从艺术到思想全盘照搬过来，还是个敏感而又重要的课题。

再其次，五四以来各文学社团、流派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

而又相互渗透的关系，这也是引人注意的。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作家鲁迅，既具备深厚的民族文学素养，也具备二十世纪的现代意识。他并不拒绝从现代主义的文学技巧中，去借鉴必要的东西。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他的散文诗《野草》中有革命象征主义的因素，而他的《故事新编》又运用了某些荒诞的手法；我甚至认为鲁迅创造了一种二十世纪的独特的东方幽默，这要比今日西方的“黑色幽默”深刻得多。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鲁迅本质上的现实主义特征。反过来说，那些一度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倾向的作家，如《画梦录》时代的何其芳、《望舒草》时代的戴望舒、《鱼目集》时代的卞之琳，后来都日益靠近了现实主义。这种情况，非常相似于欧洲的一批作家，如艾吕雅、阿拉贡、贝希尔等人的情况。这就证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渗透，而且存在着相互转化的现象；尤其是“现代主义”者向现实主义的转化，更具有时代的戏剧性。过去我们时常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看作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显然是过于简单了。

再其次，各文学社团、流派之间的竞争和消长，还受着其他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制约。一般来说，一个文学社团、流派的消亡，是先由其内部的分裂解体造成的。一九二五年十月，北京突然出现了以高长虹、向培良、黄鹏基等为中坚的莽原社。但没过多久，内部便发生分裂；高长虹另立门户，成立了狂飚社。造成这一分裂的原因，是高长虹揭起来尼采主义的旗帜（当然，其他的人事原因也是有的）。在尼采的“超人”哲学指导下，狂飚社仅限于对社会的“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这是哲学“入侵”文学的结果。至于政治思想对文学的干扰，那就来得更为直接和猛烈。创造社初期的诸君子，后来很快在政治上分化。例如郭沫若高喊“我在地球边上放号”，王独清却低吟“我从咖啡中来”；一个走向共产主义，一个走向无政府主义。类似的情况，几乎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于所有的文学社团之内。所以鲁迅在《〈中国

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变化。”这就充分揭示出文学运动的复杂的多元性，也揭示出文学思潮耦合的松散性和变化的必然性。

所有上述情况的发生，我认为都是自然的，无须感到惊骇和困恼。现代文学史上各文学社团、流派、刊物、风格的竞争消长规律，很可能在今天还适用着。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虽然很早便提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这一方针的贯彻时常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以致于我们未能按照文艺运动本身的规律，来推进当代文学思潮。如果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能够从历史到现实来阐发文学社团、流派、刊物、风格的竞争和消长规律，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四

我在前面说过，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纵横两条线交叉形成的新的文学坐标系。纵的线是指本民族文化传统，横的线是指外国文学的影响。有一位研究者说，新文学运动是东西方文学在中国土地上接触碰撞的结果。这说法与我的“交叉说”基本相同。但这种交叉或碰撞，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形成了哪几种融合模式？在融合时，不同文化的聚力和斥力是怎样实现对立统一的？若是以中国民族文化为本位来说，应当怎样来借鉴、吸收外来的文化？——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更认真、更深入地加以思考。

历史表明：东西方文化交叉产生的结果，必然是一种新文化的产生，“新瓶装旧酒”是不可能的。鲁迅说过这样有趣的话：“拉旧来帮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拖《红楼梦》来附会十九世纪的恋爱，所造成的还是宝玉，不过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